

“寿诞”“寿幛”隐藏的秘密

“人臻五福，花满三春”是古老民族的千古热望和永恒追求。“五福”之中，“寿”居首位。于是，自然而然，传统的“寿诞”“寿幛”“寿联”“寿匾”“寿坊”便以一种独特的寿文化形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人生礼仪庆典中焕发出绚丽斑斓的彩霞。

早在2004年，笔者发现藏身于美梅村荔枝林中孙中山题颂的“耆年硕德”寿坊，聆听时年104岁的老寿星陈秀梅讲述寿坊主人——丈夫的祖父吴汝功的寿诞传奇。老寿星经历了祖父六十一、七十一和八十一寿诞，曾亲手悬挂“寿幛”“寿联”，招待亲戚朋友。

讲起当年礼仪盛况，老寿星的眼睛瞬间闪闪发亮。她回味，她沉思，她在追忆那逝去的美好岁月，那曾经令人艳羡的家庭寿庆盛宴，那作为孙媳引以自豪的时光，以及因为这么一座寿坊给吴氏家族带来无比荣耀的同时，也给了这个家族不堪回首的麻烦。

问及“寿幛”“寿联”“寿匾”去向，老寿星先是说“丢了”。稍为迟疑，她又接着说“侄子多昌藏起来了”。从“丢了”到“藏起来了”，可想而知，她对那些遗留物品的去向与是否给外人展示的心情纠结。为看寿幛寿联，我们几多周折，几次商酌，吴多昌几番犹豫。

吴多昌是吴汝功的五世孙，他们夫妇珍藏高祖的寿幛、寿联，藏得严严实实。因为“家世显赫”的缘故，他们经受不少磨难。好在云开日出，珍藏的寿幛、寿联终于躲过劫难，所以轻易不肯示人。也许精诚所致，金石为开，他终于答应将在某日上午从外地返家等候。

可是，天公不作美。翻开2006年6月28日笔记：“上午，风雨交加，预报台风8级。幸得市文联副主席钟南平文化相助，驾车送我到永兴，到吴多昌家鉴赏他高祖吴汝功寿诞文化遗存。看我们冲风冒雨而来，吴多昌小心翼翼地打开‘神床桌’的柜门。”

似乎苍天也为寿幛、寿联的境遇落泪。屋外风狂雨骤，屋内灯光昏暗，珍藏上百年的数十幅寿匾、寿幛、寿联、寿鞋、寿帽、百寿宝图以及当年祝寿用的桌簾、椅垫、灯具、烛台等重现真容。这些文化珍宝虽然掩藏百年春秋，但精华难掩，异彩纷呈，灿然夺目。

吴多昌和堂弟拉起了一幅红底银字、名为“椿老桂芳”的寿幛。这是一幅精心刺绣、量身订制的横贯正厅的“寿礼”。寿幛题写“恭祝敕授布政司照磨勋臣吴老伯大人七秩开一荣寿之庆”的字样。吴汝功“七秩开一”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距今116年。

吴汝功时年61岁。古人以十年为一“秩”，60以外称“开七秩”。唐人白居易有诗：“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其时，诗人才62岁。依次而序，70以外称“开八秩”。白居易诗

句：“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他解释，“时俗谓七十以上为开第八秩”。

追忆传统文化的称谓，琢磨寿幛的文化意蕴。所谓“照磨”，《元典章》记载：明清时期，各省布政使司所设的“照磨”，其含义是“照刷磨勘”，职责是“纠弹百官非违，刷磨诸司文案”。从寿幛题赠得知，八品文官吴汝功的社会地位和赠送者的文化友情。

从那以后，每隔十年，寿诞便按时举行。吴家藏有高祖71岁那年（1911年）题有“寿近古稀荣膺国杖”和“敕封修职郎，例授按察司照磨勋臣、妹丈大人八秩荣寿之庆”的寿联，藏有81岁那年（1921年）题为“美髯添霜年高绮里”和“前清例授布政司照磨吴府老先生九秩晋一荣寿志庆”的寿联。所藏寿联，极为罕见，其中以“九秩开一”者居多。

这是清末民初海南寿礼文化遗存大汇集，这是羊山寿诞礼仪习俗大展示。通过寿诞的题颂文字，我们知道吴汝功曾被“敕封修职郎”，古稀之年社会交往还很活跃。从“前清例授布政司‘照磨’……”的题颂中了解到，耄耋之年的吴汝功在羊山地区享有盛誉。

鉴赏吴家珍藏的寿诞遗存，最发人深思的是“春山氏”辛酉年（1921年）工笔临摹的“福禄寿全图”。图中的“南极仙翁”圆脸大耳，皓首白眉，他手执拐杖，杖头悬挂葫芦在“祝人长寿”；他身边的鹿（禄）、蝠（福）、灵芝、仙草、双凤等构图精美，寓意吉祥。

最引人瞩目的 是字体秀逸的四条寿幅。书云：“事芝采商山而年跻……勋臣先生者，其行谊有足称，其提祉有由致也。先生为延政老先生哲嗣，德门衍庆，勋阀储英……”大意是赞扬吴汝功隐居山村，好比“商山四皓”中的四位老人，知进知退，明德睿智。

是谁送来这幅龙凤飞舞、精美绝伦的寿幅？是谁写下文采飞扬的溢美之辞？这里头到底隐藏哪些文化密码？一套寿礼落款签名，整整写满三个条幅，人数之多实属罕见。

题颂者有：“钦加三品衔、翰林院修撰、广东全省法政学堂监督、状元、愚弟夏同龢，钦加五品衔、特授浙江富阳县军粮厅调补、黄岩县县丞、外兄王均政，候选教谕、岁贡生、姻愚弟蔡桑春……”都是文人雅士，亲朋好友。夏同龢官三品，王均政官五品，他们为何与吴汝功称兄道弟？

除了以上“四条寿幅”之外，夏同龢、王均政等11人还题颂赠送镌有“寿溢古稀”字样的寿匾。这方寿匾选用海南金丝楠木制成，匾面平阔，雕刻精致，文字凝练，造型厚朴，古色古香，虽然历经百年岁月，寿匾仍完好如初，是一方极其珍贵的寿诞文化遗存。

是否因为这方寿匾题颂，致使孙中山次年给吴汝功老寿星赐赠寿匾？

羊山寿星吴汝功

本文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



孙中山为吴汝功题赠的“耆年硕德”石牌坊。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孙中山题赠“耆年硕德”寿坊

孙中山对海南有深深情结，他先后为海口寿民题赐了两座寿坊。唯一完好无损的是掩藏在美梅村荔枝林中的“耆年硕德”牌坊。另一座是题赠赐予美兰区灵山镇福同村寿民钟光传的“年高德劭”牌坊，那座早已损毁，只剩下匾额。因而，美梅村这座幸存的寿坊更显弥足珍贵。

这座用火山岩条石构建的寿坊，板材精致，雕琢精细，造型精美，构架结实。寿坊正面横梁上“耆年硕德”四个楷体大气气势沉雄，刚健遒劲，与“天下为公”牌匾的用笔极为相似。看着眼前熟悉的墨宝，使人情不自禁想起一代伟人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



吴汝功71岁寿诞时收到的“椿老桂芳”寿幛。

蒙乐生 摄

寿坊由当时主政广东并兼任大总统内务部长的陈炯明建造，琼山县民选县长吴邦安督造，时为1922年2月。无独有偶，这两个人都是法政学堂的学生。建造寿坊呈请人是王国宪、吴精粹、吴锦澄等14位乡耆，以及吴汝功的儿孙吴玉清、吴玉芳、吴玉芬等多人。

孙中山亲自为寿星吴汝功题赠寿匾，由陈炯明负责建造寿坊，由琼山县县长吴邦安监督建造，在海南岛绝无仅有。这对吴汝功家庭，对整个吴氏家族来说，都是无限荣耀，无比显赫，无上尊贵。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一时，羊山百姓传为美谈。

寿坊的建造者陈炯明是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是维新运动培养的立宪人物之一。陈炯明受恩师夏同龢的法政思想影响极其深刻，曾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陈炯明早年参加同盟会，曾策划广东独立。但是陈炯明抱袁总统府，距建造寿坊不到4个月的时间。

立座寿坊，风云激荡，起伏跌宕，议论纷纭。吴氏裔孙后来的人生际遇一度跌入谷底，实在是立坊之初始料未及的。

然而，世事没有如果，只有结果与

后果。与创办法政学堂的状元及状元学生结缘，可谓求之不得。若非如此，吴汝功次子焉能入读广东法政学堂，孙子怎能入读上海政法大学？后来，次子渡海覆舟殒命，孙子毕业之后当律师，后来在社会大变革中遭遇不测，那是后话。

其实，当年入读广东法政学堂的海南士子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吴汝功的外兄王均政的次子王梦云负笈羊城，18岁考取广东法政学堂，后来官至“中将”；吴家近亲曾祥鹤也是考取广东法政学堂，后来成为广东银行行长。时人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此外，当年入读广东法政学堂的还有海口市市长流镇的李午天，后来成为广东高要检察厅首任厅长；海口石山的陈中殿、陈近增也就读广东法政学堂。

寿坊督造者吴邦安，出身书香世家，也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算是陈炯明的“同窗”。1922年，他以压倒多数票当选琼山第一届民选县长。任内，他躬亲县政，修桥筑路，扩建市场，增设学校，振兴教育，颇受民赞誉。

有父母官督造，难怪寿坊如此坚固，如此气派。后来，军阀邓本殷乱琼，民心尽失，邦安辞职，负笈羊城，易名“钦祥”。1927年，受广州国民政府委派，吴钦祥主政梅县，深受当地父老称誉。据传，梅县城内有一街道命名“钦祥路”，以纪念他的治梅德政。

寿坊的呈请人王国宪也是琼山人，立牌坊时他的身份是海南名儒。王国宪17岁就考中案首（秀才第一名）；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他考中广东第一名优贡生，不久就读广州广雅书院，毕业后就任广东乐昌县教谕、广东省议会议员等职。

辞官归里后，王国宪先后任研经书院、琼台书院掌教。其间，他筹款捐修“文昌阁”，开设爱生医院，呈请政府拨款补贴，免费为群众治病，乡里称赞，百姓称便。客观地说，王国宪对寿坊建造有功，是他的呈请促成了寿坊建造。但是，当年陈秀梅对此不置可否。

陈秀梅不置可否，是对家庭变故的沉默。立坊次年，82岁的吴汝功带着无限眷恋去世。他无法知道，在将近百年之后的2015年，因寿坊造型精美，工艺精湛，整体构件完整，是海南保存得最为完整的石牌坊之一，具有重要的文物保存价值，被列为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寿坊具有文物价值，陈秀梅并不知晓。2008年，106岁的陈秀梅去世，与她相比，吴汝功不算高寿。他们生活年代不同，引人瞩目的程度也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书写了寿星传奇。

笔者有幸目睹寿匾、寿幡、寿幛、寿联、寿匾、寿坊，有幸聆听羊山寿星传奇故事。面对省级文保，面对探古寻幽、寻寻觅觅探访“耆年硕德”牌坊的游人，吴氏后人萌生了为吴汝功撰写行状的想法。毕竟，这座寿坊凝聚了这么多历史英杰、乡绅达士，隐藏着那么多悲欢交集的乡土故事。它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乡土社会的变迁史，记录了与寿坊相关的羊山寿星逸事以及寿诞礼俗文明。这寿坊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图



晚清状元夏同龢等人给吴汝功赠送的寿幛。

蒙乐生 摄



吴汝功后人珍藏的一幅“百寿图”。

蒙乐生 摄



2006年，吴汝功的孙媳妇、104岁的陈秀梅老人。

蒙乐生 摄

清末状元夏同龢传奇

文|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

夏同龢是何方人氏，与出身琼北山村的吴汝功有什么关系？为何三番四次为吴汝功祝寿？

夏同龢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御笔钦点”状元，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夏氏是贵州科考仅有的两名文状元之一，是中国第一个以状元身份出国求学的留学生。他毕业归来创办中国最早的法政学堂——广东官立法政学堂，并因此与吴汝功结缘。

状元被逐

1898年，夏同龢参加紫禁城保和殿举行的戊戌科殿试。主考官是励志变革的光绪皇帝，他专就“才学、经武、绥远、理财”四个问题“金殿问策”，夏同龢侃侃而谈，帝师频频点头。一天应对，夏同龢交上了一份完满答卷，缓步走出金殿。

夏同龢根本没有想到，笼罩在夜幕下的紫禁城正酝酿一场关系国家未来的政治风暴。殿试第二天，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发生，光绪皇帝颁发了《定国是诏》，主张改革政府机构，任用维新人士……这场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是当年国民的议论热点。

夏同龢更没有想到，夺魁之后他被授予修撰一职，进入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翰林院是历练朝廷重臣的“培训基地”。进入翰林院意味着踏入仕途，有机会进入国家政治的核心圈层。对非常时期脱颖而出的新科状元来说，夏同龢注定要经历非常事件。

时年58岁，时任“布政司照磨”一职的吴汝功当时虽然不在这场风暴的漩涡，但对非常时期的非常变革，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疯狂镇压，对光绪皇帝被囚禁深宫，对维新派有为和梁启超亡命海外，“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也有较清醒的认知。

夏同龢是幸运的，虽然风雷激荡，但新任翰林院修撰有惊无险。风波平息后，慈禧曾怀疑“天子门生”夏同龢，质问“状元及第”的每个细节。慈禧想起了光绪的帝师翁同龢、夏同善，夏同龢与翁同龢异性同名，与夏同善同性而异名，为什么这么凑巧？

翁同龢也是状元，驰骋晚清政坛，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又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可谓位高权重。因陷入“帝党”与“后党”之争，夏同龢中状元后第四天便被慈禧逐出京城。

夏同善学识超群，深受慈禧赏识，受命为帝师与翁同龢一同为皇帝侍读。

慈禧虽然怀疑，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两位帝师与夏同龢有所牵连，会试主考官户部尚书孙家鼐与夏同龢也毫无瓜葛。至于光绪皇帝钦点状元，也是夏同龢在进士中出类拔萃，在殿试中独占

鳌头。是否因姓或名与帝师吻合，或因帝师被逐而皇帝故为，无从猜料。

留学东瀛

虽然夏同龢在时代大变革中幸免于难，但心头浓云却因此长久挥之不去，读书人“兼济天下”的理想已成泡影。次年，夏同龢南下广东，结识了吴汝功等一批志士。5年后，夏同龢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学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留学生”。

夏同龢学习勤奋，学业优秀，所著《清国财政策论》曾刊登于日本《法律新闻》。他留心政事，编写中国最早介绍现代行政法律的专著《行政法》。西风东渐，风气日浓，他的恩师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而他则筹办官立广东法政学堂（中大前身）。

1905年冬月，夏同龢出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即校长），是“普法于国民”的先行者。作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学堂章程开宗明义，称“本校为研究法政学而设，各学员随时随事皆应自律于法例之中”，他因此有更多机会与广东各界人士交往。

当时，官方规定，上至道府，下至知县佐杂及候补官员，不管年龄大小，除在国外学过法政，或要职在身无法离岗者外，其他人一律报考法政学堂学习法政。如果借故不报考或故意逃课记过停职，不毕业不准复职……夏同龢办法政学堂谱写了民国法政新篇。

孙文授勋

辛亥革命之后，夏同龢离开广东法政学堂，先回贵州，在贵州参选成为众议院议员，然后北上京都，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并加入国民党。当时，国会各党派为争夺更多议会席位以谋求更多权利，展开了激烈竞争。夏同龢逃避纷争，脱离了国民党。

1913年7月，夏同龢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委员。在平均年龄只有33岁的年轻委员中间，夏同龢虽然旧日功名最高，但他并不倚老卖老。历时三个多月的宪法起草，夏同龢提出了由人民初选后组织选举机关选举总统的这样一种开放式的依法选举办法。

1914年，袁世凯解散议会后，夏同龢出任政事堂金事、知事试验委员、湖南都督府高等顾问官、湖南国税厅筹备处处长、法制局金事等职。1917年至1919年，夏同龢出任江西省首任实业厅长，在地方建设中有建树，获孙中山授予的二等大绶嘉禾勋章。

有意思的是，吴汝功也荣获二等大绶嘉禾勋章。图